



Semantic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Yingyang*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hao LIU

Abstract: Placing *yingyang*,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of “nutrition,” i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odern China’s social ethos, this article examines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cultural events, such as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ideas, the arousal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rovincialization of Marxism.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intends to investigate *yingyang*’s semantic changes throughout history. It turns out that since the initial introduction of *yingyang* into China, it has undergone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spiritu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evolving from a scientific term to a 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 and then to a discursive tool adopted by CCP’s official ideology. Alth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ook place over 50 years, it featured multiplicity, autonomy, and integrity in general. The concept of *yingyang*, as a consequence, possessed a dual-reflection structure that glorified the spiritual proper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 while denouncing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and thus constituted an echo of the political reality.

Keywords: *Yingyang*, Spirituality, Historical semiosi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National form of art and literature

Author: Chao LIU earned his PhD degre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in 2014. He is now professor of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the Xue-heng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roughout history and worl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He has published over 40 peer-reviewed articles and 3 monographs in recent years.



思想史視域下“營養”概念在現代中國的語義變遷

劉超

[摘要] 本文將“營養”概念置於中國現代社會思潮的演進脈絡中，考察其與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左翼思想的傳播、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事件間的密切聯繫，從而對其歷史語義的變化軌跡加以全方位梳理。本文認為，自晚清時期“營養”被引入中國以來，其思想內涵一直在經歷著“精神化”與“本土化”改造，從一開始的科學術語發展為文化價值觀念，再到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話語資源。這一過程雖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卻呈現出開放性、自主性、有機性的總體特徵。在此過程中，“營養”概念以隱喻和轉喻的方式擁有了正反兩面的雙重指涉，分別代表了對民族的、大眾的精神屬性的頌揚以及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諷刺和批判，與現實政治之間形成了有趣的呼應。

[關鍵詞] 營養 精神性 歷史衍義 中國現代思想史 民族形式

[作者簡介] 劉超，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比較文學專業博士，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暨學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外文化關係與社會思想史。近年來，在國內外知名學術刊物發表論文40餘篇，出版中英文專著3部。

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來到剛剛成立不久的魯迅藝術學院，對全體師生發表講話，進一步明確了“民族解放的大時代”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藝術事業”的指導原則。在講話中，毛將文藝創作比作“做飯菜吃”，提出藝術作品要“既有營養，又有好的味道”；對何謂營養，他進一步解釋道：“要注重營養，也就是要有好的內容，要適合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①由此，“營養”作為超越生理學範疇，與文學、藝術、道德、宗教等精神性存在相關聯的抽象概念，得以正式進入官方話語體系，被賦予了時代性、大眾性、進步性的思想內涵，並在意識形態生產與傳播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政治隱喻功能。然而，回到原初的歷史語境之下，“營養”這個晚近才輸入中國的舶來品，是如何一步步被知識階層及普通民眾所接受，又是如何通過符號衍義的方式從一個科學概念轉化為一個社會文化概念的呢？在智識領域，哪些東西被當成是有“營養”的，哪些又被視作是對“營養”有害的呢？儘管這一問題的解答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代概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內在邏輯，卻往往為先行研究所忽視。與此前研究者們多從科技史角度入手，聚焦於營養知識的普及與營養保障體系的建立^②不同，本文關注的重心則是“營養”一詞在中國社會不斷被抽象化乃至意識形態化的總體脈絡。就像皮爾斯所說的那樣，“只有被解釋成符號，才是符號”^③，正是特定歷史場域對於符合當下需要的“待在”（becoming）意義的一次次召喚，才使得“營養”成為近現代中國含義最為複雜、應用最為廣泛的語詞概念之一，並因而能夠揭示大變革背景下時代發展的思想軌跡。

一 中西雜糅：作為現代科學術語的“營養”在中國的確立與傳播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尤其是歷代醫書當中，“營”“養”聯用、組成詞語的例子屢見不鮮，但意思卻同今日“營養”作為動詞表示“吸取養料以維持生命”及作為名詞表示“養料”或“有助於發展的滋養物”的用法存在著較大差異。“營”指的是『黃帝內經』所說的“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焉”^④的“營氣”。“營氣”被認為來源於五穀，經腸胃吸收後，隨血液循環，為人體提供滋養，這一過程就是“營養”。顯然，上述認識已經具備了樸素的科學觀念，雖未能對相關生理機制做出精確的描述，卻構成了銜接其現代對應概念的語義基礎。由此生發，在社會經濟層面，“營養”又可以用來指代生計、營生，並常常同孝敬父母聯繫在一起，帶有一定的褒義色彩。^⑤

而“營養”在漢語中成為一個生理學專業術語，並與西文裡的“nutrition”“nutrient”或“nährstoffe”相互錨定，則要歸功於20世紀初的留日知識分子。在此之前，儘管羅存德於1866年至1869年編纂的『英華詞典』便已列出了“Alimentary”這一同“營養”意思相近的詞條，還將其解釋為“having the quality of nourishing”，可對應的中文翻譯卻是“補身之物”“養身之物”。^⑥同樣，之後由傅蘭雅與樂學謙合作翻譯、被譽為“中國近代生化學或營養學啟蒙著作”的『化學衛生論』雖然詳細說明了各類食物的化學成分和營養價值，並嘗試以科學的方法來解讀新陳代謝等生命現象，但其大量使用的也是“滋養”，而非“營養”。^⑦直到1903年，在日留學的蔣智由才以“觀雲”為筆名，在其擔任編輯的『新民叢報』上發表「華年閣雜談」一文，用

①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毛澤東全集』第12卷（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第139-140頁。

② 如鄭集的「現代中國營養學（1920-1953）史料」、顧景范的「我國現代營養學早期發展史」、季鴻崑的「丁福保和中國近代營養衛生科學」、陳加晉的「動物營養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王公的「抗戰時期營養保障體系的創建與中國營養學的建立制化研究」等論著，所展開的都是科技史層面的考察。

③ Charle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p. 308.

④ 譚一松、何文彬主編：『靈樞經』（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8），第318-319頁。

⑤ 如「彪君墓志銘」裡就曾提及“既而連遭大父母喪，竭力營養，不汲汲求進。獲薦之日，年逾四十，益念親老，不復求仕”。見胡宏：『五峰集』卷三，清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第36頁。

⑥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p. 44.

⑦ [英]真司騰：『化學衛生論·卷一』（上海：上海格致書室，1890），傅蘭雅口譯，第38頁。

“營養吸收系”稱呼人體的消化系統，與“循環器”即循環系統相並列，把二者視作決定個體生理及心理性狀的重要器官。^①這樣的論述，無疑以近代生物學理論體系為基礎，和仍處於“原始綜合狀態”下的舊式營養觀截然不同。蔣的用法很有可能是對當時日本社會通用譯名的一種仿效。實際上，自杉田玄白在『和蘭醫事問答』中率先以“えいよう”指稱科學化的“營養”概念始，到明治中後期，這一詞語已然隨著教科書的發行與營養知識的普及而廣為流傳^②，身處日本的中國知識人受其影響，採用同樣的譯法，並不足為奇。稍後，同為留日學生的汪榮寶與葉瀾在1906年編纂中國近代最早的“新術語工具書”『新爾雅』的時候，雖未將“營養”單列為詞條，卻沿用了“營養”一詞，對血液的形成機理進行闡釋：“人體及高等動物，營養身體組織之貴要流動液曰血液。合血清纖維素為血漿，亦謂之血液的成形原質。”^③由於留日學生在晚清社會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話語權力，“營養”及其相關學說也被他們一併引入國內，以講授新學的名義，多次出現在『四川學報』等官辦刊物上，開始為各界人士所熟知。^④1909年，嚴復在其編訂的『中外名詞對照表』中正式把“Alimentation”譯為“營養”，並得到學部的檢核審定^⑤，至此，“營養”作為標準譯名的官方地位得以確立。

此後，直至1919年“五四運動”全面爆發，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以『申報』『大公報』『婦女雜誌』等知名報刊為平臺，大量涉及營養學知識的介紹性文章得以見諸紙面，但人們對於“營養”的基本認識大多仍停留在衛生保健的範疇，“營養”飲食，特別是母乳餵養，被認為是促進嬰幼兒成長發育及婦女產後恢復的關鍵。^⑥在此過程中，以丁福保為代表的中醫師們扮演著積極倡導者的重要角色，他們從傳統醫學“脾胃為後天之本”^⑦這一思想出發，強調消化吸收對個人健康的決定性作用，而把所謂“營養障害”視為各類身體及精神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此基礎之上，他們不僅主張調和“營衛之道”與新陳代謝理論，試圖借助營養化學知識來辨證論治，還熱衷於採取中西醫結合的辦法對人體消化功能進行調理，以達到健胃消食、強壯筋骨的目的。^⑧他們這種中西雜糅、帶有鮮明折中色彩的營養理念雖然始終未能得到主流意識形態所支持的科學世界觀的接納和認可，卻對民間社會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普通市民階層的一種常規生存策略，並為“營養”概念的進一步引申和衍義埋下了伏筆。

幾乎與此同時，“營養”所蘊含的生物有機體假設也啟發了梁啟超等本土思想家，促使他們把國家看做生命的最高形式，而把構成其能動要素的國民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進而以一種轉喻的方式，將個體的“營養”活動導向國家對物質資源的需求和爭奪，以此證明推行“國家主義”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正如梁啟超在「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中所論述的那樣，古代之國家為一人或若干人之所有物，“今世之國家，則為獨立之一人格”；隨著國家日臻“成熟”，“內部藉善良法規之維繫，秩序嚴整”，“休養生息”之餘，則“人口日滋”，“又教育整備，而民之智力日以富焉，機械利用，而民之資力日以溢焉”，不斷增加的人口和不斷增強的欲望必然超出“所以營養之土地”所能承受的極限，於是只能“求尾閭於外”，即“舉他國民所資以營養者，奪之以自營養而已”。^⑨通過這一生命成長與國家發展、個人生存與國際競爭間的聯繫和類比，梁啟超所要宣揚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視域下中國內部的社會整合與協同進化，而“營養”則是將“群”“我”聯結在一起、使華夏舊邦重獲生機的關鍵。對於梁而言，達成上述目標的前

① 觀雲：「華年閣雜談：營養質之人」，『新民叢報』（1903集編）：1012。

② 並松信久：「栄養学の形成と佐伯矩」，『京都産業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系列』34（2017）：30。

③ 沈國威編著：『新爾雅』（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第171頁。

④ 見「論說：新學名詞」，『四川學報』9（1905）：3。

⑤ Karl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 37.

⑥ 見瞿姚英乃：「小兒營養法」，『婦女時報』15（1914）：24。

⑦ 李延罡：『脈訣匯辨·沖陽、太溪二脈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3），第16頁。

⑧ 見丁福保：「學校病一夕談（續）」，『大公報（天津）』1911-07-04，第15版。

⑨ 梁啟超：「世界大勢及中國前途」，『飲冰室合集·文集』第7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3頁。

提在於“無自相掣”“無爭奪相殺之禍”，使向外獲取“營養”成為全體國民的共同使命，而一旦國人，尤其是他們當中的“上流”階層，“不知團體之利害即己身之利害”，“賴國家以自營養”，^①或是“盡刮國家膏髓”，“以資黨人之營養”，^②則“國將不能以一朝自存於天壤”。在這裡，梁啟超有意識地區分了“營養”的兩種不同類型，一種是為自身或所在小團體竭力謀取財富、權力，為此不惜犧牲民眾的利益，另一種則是“個人生計”與“國民生計”的統一，即梁於1926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演講時所定義的“經濟”，在他看來，“經濟是社會的營養料，也是社會的一要素”，就如同“血脈”一般，對民族國家意義重大。^③對前者之於後者的危害性，梁另一篇題為「矛盾之政治現象」的政論文以清末財政危機為教訓，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文章痛陳清政府藉口“國中民窮財盡，乃謀獎實業以營養之”，卻將所需之巨額經費攤派在百姓頭上，結果所籌資本經過各級官員層層盤剝、中飽私囊，最終所剩無幾。由此，梁不禁感慨道：“循日以往，則實業廣興之日，斯即全國人盡為餓殍之時也。”^④除了梁啟超之外，“營養”這一貶義用法也被同樣著眼於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新一代知識人所接受和仿效，並同社會主義學說結合起來，成為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批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

二 “營養”概念的“精神化”及其人文主義底色

如前所述，“營養”概念中國旅行的早期階段雖然呈現出顯著的中西雜糅的特質，即“營養”的現代知識內核與其傳統語境下“營衛”“生計”二義的深度融合，但在此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物質主義、科學主義、進化論這些由西方傳入的價值觀念，其致力宣揚的也是“保種”“合群”“救國”等社會革命主張。在這個意義上，“營養”語義的嬗變所傳達的內在訴求與“新文化運動”的宗旨並無二致，與其說“新文化運動”平地一聲驚雷，為中國人迎來了“德先生”和“賽先生”，毋寧說它是時代精神的縮影，是對晚清以降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總結。有趣的是，一方面，“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思想文化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新青年》本身為例，群益書社時期，雜誌長期乏人問津，“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⑤，發行量一直不到1000冊，甚至在1917年下半年還遭遇過長達三個多月的停刊危機。然而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銷量驟增至16000冊，由於僧多粥少，在很多學校，一份雜誌往往要供十幾甚至幾十個人傳閱。^⑥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知識階層針對“營養”問題的主要切入點也從物質領域轉移到了精神領域，不僅湧現了大量試圖統合“營養”之生理與心理機能的理論論述，還產生了各種從不同視角出發對何謂“有營養的”精神性事物所做出的定義和闡釋。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巴黎和會上列強的醜惡嘴臉，促使中國人民從震驚中覺醒，開始反思並質疑西方現代物質主義、科學主義、工具主義世界觀的合理性，相反，在諸多“反現代”思潮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而去擁抱道德、宗教、文學、藝術，“營養”概念的延伸也因此蒙上了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這一新的變化既昭示了前一個時代的逝去，又標誌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全面展開。

首先對“營養”機能的統合問題提出自身觀點的是文化史學者陳安仁。在他於1920年至1924年撰寫的一系列論文中，陳先是直陳人生“為世界之一分子，此一分子不能與世界相離”，二者均為所謂“自然大法所支配”，^⑦從而揭櫫了“精神離不了物質”^⑧的基本原則，緊接著又從人類

① 梁啟超：「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冊，第44頁。

② 梁啟超：「中國政黨政治之前途」，《梁任公文鈔·卷五》（上海：上海共和編譯局，1913），第82頁。

③ 見梁啟超：「文物專史總說」，《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第178頁。

④ 梁啟超：「矛盾之政治現象」，《飲冰室政治論集》（上海：廣智書局，1910），第145頁。

⑤ 魯迅：「自序」，《吶喊》（上海：北新書局，1926），第Ⅷ頁。

⑥ 唐寶林：「陳獨秀與五四運動」，《教學與研究》8（1999）：59。

⑦ 陳安仁：「探究世界之真相以解釋人生普遍的意義」，《人生問題》（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第52頁。

⑧ 吳稚暉：《吳稚暉先生文粹·二》（上海：全民書局，1928），第78頁。

的生理需求出發，指出“衣食足而後禮義生”，如果“民食未解決”，則“人民之身體、精神弛緩孱弱”，必將產生諸多弊端，道德教化也將淪為“空談”；因此，陳斷言，“人類所有肉體精神，種種疾病與痛苦，多因幼年食物不足、營養不良之故，”^①“營養”儼然成了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儘管陳安仁一開始貌似站在科學派的立場上，但他接下去的闡述卻突然轉向“生命意志論”，將“營養”活動置於叔本華式的“生命意識”的統攝和支配之下，以脫胎於“生命意識”的“求生、愛生、利生之欲”作為“吸收營養”的原動力，並由此確立了後者形而上的精神性本源。^②這一跨越經驗論與先驗論兩級的折中態度既是“科玄論戰”前後中國知識界開放多元的話語生態的一種體現，也反映出“營養”概念集自然性、科學性、社會性、思想性於一身的複雜面相。陳安仁的部分論述被彼時正在法國修讀教育學碩士的周太玄所繼承。周沿用了西方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分類，把靈魂分為植物靈魂、動物靈魂、人類理性的靈魂三種，由低到高排列，而與植物靈魂相對應的正是營養功能。在周看來，營養是生命產生的基本條件，只有在特定液體“營養充足”的情況下，才能形成細胞，再由“基本生命”發展為“群體的生命”；而各種心靈活動，只不過是“基本生命的一種附帶現象”。^③相比較陳，持有“生物決定論”思想的周太玄刻意凸顯了生命的物質屬性，試圖用科學來解釋各種心理現象，並為此把營養拔擢到了萬物起源與靈魂肇始的位置上。儘管這樣的論斷大有林宰平所說的極端的“排他”傾向、“統一一切”的“野心”之嫌，^④並在發表後遭到不小的非議，^⑤卻為“營養”與精神領域內各類活動的聯結提供了進一步的正當性依據。

針對周的這種科學主義“營養人生觀”，張東蓀和朱光潛分別從生命哲學和精神分析理論入手，做出了相應的反思與修正。和周一樣，張東蓀也引用了“三靈魂說”，並認為營養作用為植物靈魂、動物靈魂及人類靈魂所共有，但他始終拒絕用“營養”來概括人的本質特徵，相反，他提出，人類行為的最終的目的應當是“發展吾人所獨具的理性”，雖然營養作用、感覺作用的發達也很重要。但這種發達“須使其在理性之下以發達耳”，其發展並非“獨立的發展”，而是為理性掌控的“支配的發展”“調和的發展”。^⑥也就是說，“營養”對於人而言，與思想意識密不可分，二者應該相互調和、協同演進。至於“營養”在人們心智展開的過程中具體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張借用了柏格森的“生命衝動”理念，進一步論述了“營養”的正反兩重功效：就正面來說，在“生命衝動”的引導下，人們會吸收超過“營養自身”所需的力，初時供身心成長，到了成年後有了餘裕，便“能自由散發”，產生“利他之情”，“使其篤于友愛，勇於任事，有犧牲精神，這都是由於精力滿溢而使然”；^⑦就反面來說，“生命衝動”從起先只關注於“自己營養”到轉向“欲”，並“趨於對象”，在途中會存在“不少的執住（fixation）”，遭遇“不如意的境遇”，從而使精神“返身向內起來了，這時候便發生了想像”，由此上升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⑧值得注意的是，張在這裡所說的“生命的衝動”，被他直接定義為“精神力”或“意識”，^⑨有基於此，通過對人體生命活動及生長歷程的科學描述，張最終指向的乃是一種超出物質現實之上的心理機制，而“營養”也因深度參與其中而被賦予了更多的精神屬性。朱光潛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與張東蓀大同小異，然而他的知識背景卻是精神分析學說自弗洛伊德至榮格的理論進展。他一方面從弗洛伊德那裡吸收了“來比多”（Libido）、“性欲”這些核心概念，另一方

① 陳安仁：「道德與人生」，《人生問題》，第283頁。

② 見陳安仁：「生命演進與人生概念」，《人生問題》，第403-404頁。

③ 周太玄：「宗教與人類的將來」，《少年中國》3-1（1921）：31。

④ 林宰平：「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時事新報·學燈》1923-06-05，第1版。

⑤ 羅章龍：「五四運動和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第463頁。

⑥ 張東蓀：『道德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1），第455-456頁。

⑦ 張東蓀：『道德哲學』，第401頁。

⑧ 張東蓀：「瓊格的三大貢獻」，《精神分析學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第54頁。

⑨ 張東蓀：「瓊格的學說」，《精神分析學ABC》，第46頁。

面又反對弗洛伊德的性欲中心主義觀，並把“來比多”分為“營養”“求偶”“適應環境”這三個組成部分，置於個體成長與社會進步的鏈條中：個體為了保存自身，“所以發出種種活動去求營養”，為了保存種族，“所以發出種種活動去求配偶”，而隨著文化的進步，為了“適應社會環境”，所以要從事“道德、宗教、文藝種種較高尚的活動”；^①社會“文明日進，生活日繁”，也要求人們“把‘來比多’的潛力畫撥若干出來以應付性慾以外的需要”。^②通過這樣的方式，朱光潛正式確立了“營養”這一“普遍生命力”的初級表現形式與其高級形態，即宗教、道德、文藝間的同質關係，“營養”通往文化道路上的障礙就此得以在學理層面被清除，後者儼然成了前者自然演化的必然結果。在朱的基礎上，“珞珈三女傑”之一的袁昌英更是設想了一種循環往復的閉環結構，藉以類比“自然所經過的程式”：由物質進至生命，由生命進至精神，由精神又消失於物質中，而後捲土重來，以待生機。在此意義上，不但“營養”可以發展為“精神”，“精神”也終將歸於沉寂，化作新生事物的“營養”。

到了1930年代，隨著唯物辯證法的傳播和推廣，“物質”與“精神”“自然”與“社會”不再被視作是相互對立的兩極，彼此之間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在那些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看來，二者時刻處在一種相輔相成、互相轉化的關係之中。正因為此，“營養”概念之於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最終不再成為問題，“營養”也成了現代漢語中就對象的思想意義進行評判時最為常見的隱喻之一。無怪乎中共領導下“社會科學家聯盟”的骨幹李鼎聲會這樣論述道：“一切自然環境必須通過人為的社會環境始能影響到人類的生存，而人類自身亦常常要通過社會環境去影響、改變社會環境”，既然二者密切相關，共同組成“有機的生活”，“倘使人類不能從社會取得各種的營養資料與保護，試問怎樣去和各種的自然勢力鬥爭，又怎樣能使自己成為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主人翁？”^③對於李及他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新興社會科學運動”而言，社會的“營養資料”的現實意義甚至高於自然的“營養資料”之上，獲取前者乃是支配後者的前提和保證。儘管如此，上述聲音只構成了同時期中國知識界關於營養問題的熱烈討論的一個側面，而除了吳憲、林國鎬、鄭集、侯祥川、羅登義等生化或農化專家之外，大多數這一討論的參與者很少關心自然科學語境下的營養理論，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思想文化活動的營養價值上。

三 “新文化”語境中“精神營養”的本土化定義

那麼，究竟什麼才是有營養的呢？對此，以梁啟超為首的一大批知名文化人從不同角度切入，展開了全方位的探討。實際上，早在這之前，羅素便已將精神營養的觀念向中國公眾作了介紹。在其『到自由之路』一書中，羅素把“對於自己、朋友和世界都有益處”的生活歸因為“受了希望的鼓勵和快樂的營養”，而對“快樂的營養”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羅素則抬出了“福音書和世上各大教主”，以他們所“獎勵”的“敬愛世人”“減少暴力和貪婪”“不受制於恐懼心的專暴”以及“個人道德的再造”等理念為準繩，體現出基督教倫理思想的強烈影響。^④儘管羅素本人曾當眾宣布自己不是基督徒，還對“基督教誨中的缺點”頗多批評之辭，但他的這本論著經李季翻譯、新青年社出版之後，其相關論點很快就被旨在推動“本色化”“青年化”的在華基督教各差會所吸收，藉以招攬、引導年輕信徒。除了面向平民家庭大力普及母嬰營養知識之外，各類基督教刊物還刊載大量文章，宣揚“『聖經』的故事”是供給兒童腦筋最好的“營養品”，這些故事不僅能幫助孩子“在各方面造成良好的觀念”，還可以使他們得到“心靈的撫貼”和“上

① 朱光潛：「佛洛德的泛性觀」，《變態心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第128頁。

② 朱光潛：「融恩」，《變態心理學派別》（上海：開明書店，1930），第107-108頁。

③ 平心：「表現於個人生活過程中的鬥爭性」，《青年的修養與訓練》（上海：生活書店，1934），第57頁。

④ 見[英]羅素：「能夠造成的世界」，《到自由之路》（北京：新青年社，1920），李季等譯，第199-206頁。

帝的幫助”。^①在“非基運動”的大背景下，基督教組織對“營養”的宗教化利用自然招致了本土知識分子的反彈，他們雖然未必贊同“反基督教同盟”的激進立場，但仍傾向於從中國社會的歷史傳統和現實需要出發對“營養”的精神性內涵作出自身的解讀。

在這群人當中，又是梁啟超率先垂範，將“五四”以來“新知”的輸入視為青年學生極為重要的營養來源和解決其“學問飢餓”問題的不二法門。在梁看來，受“新文化運動”的刺激，年輕世代眼界大開，對知識的渴求也前所未有的強烈。他把這種渴求稱作“營養力”，並對“青年界”“營養力”的增強和“學問胃口”的擴大抱以“純然樂觀”的態度，預言“咱學問界的前途”不可限量。^②梁還指出，“新知”不僅可以營養年輕人，還能夠“營養”所有人“智識的食胃”，使其甘之如飴，“與學問日日相親”乃是“人生最幸福的生活”^③；相反，若是拒絕學習“新知”，一味“剽竊古人緒餘”，甚至沉迷於傳統文化的“沉澱廢質”，這便是所謂的“營養之障礙”，長此以往，則會“使得思想界失去彈力性，不能隨時代而開拓”。^④身為“五四浪漫一代”精神領袖的郭沫若發展了梁的觀點，一方面，他將“新知”的範圍進一步劃定為“從希臘文明遞演出的科學精神”，斷言科學這一“營養資料”是“充實人生”的“一扇重要的弧面”；^⑤另一方面，他又以“讀書”作為吸納“新知”、滿足“精神營養需求”的主要途徑，^⑥並強調這一過程需要“釋放自然天性”，“切不可抑制過甚，規範太多”，以便學生能夠“廣泛吸收營養”，充分發揮個人才能。^⑦

除了“新知”之外，梁啟超還首次把“審美趣味”納入“精神營養”的重要範疇：缺乏這種“營養”，會使人“壞掉愛美的胃口”，久而久之，整個民族的感覺器官也會陷入“麻木的狀態”，而美術的功用則在於持續提供“審美趣味”，讓人們“常常吸收這趣味的營養”，從而恢復業已麻木的感覺器官，“維持、增進自己的生活康健”。^⑧然而，有助於“維持、增進”心靈健康的又豈止是美術？豐子愷提倡用“高尚的音樂”“營養精神”，以促進高尚人格的形成；^⑨袁昌英呼籲通過舞蹈這一“音樂與動作合成的純精”感受“營養著他或她的火焰”，從而培養“靈性”，對抗“生命的沉悶”；^⑩而成仿吾則主張效仿歌德，“由大空之中吮吸”“新的營養”，感受“自然是怎樣惠好”，在獲得新的“愛情”與“生命”的基礎上實現對人生的超越。^⑪與他們的著眼點不同，朱光潛將“當下的思想潮流”比作“養育天才的滋料”、並告誡人們切不可“讀書少而思想狹隘”^⑫的同時，一再強調中國仍處在“新文化思想的發生期”，因此特別需要“強烈的外來影響”的“營養”，藉以刺激國人“對事物採取新穎的看法，對舊有的文化制度抱以懷疑、攻擊或者重新估價的態度”。朱進而斷言，要想避免“新文化思想老早就溝渠化，走上一條狹窄的路，納入一個固定模型”的發展困境，就必須熱情擁抱異國事物，自覺接受“四面八方的灌溉”，只有這樣，才能使其“生發期愈延長，則思想所能達到的方面愈眾多，所吸收的營養愈豐富，所經過的摩擦鍛煉愈徹底，所樹立的基礎也就愈堅實穩固”。^⑬這一向他們學習的積極態度也是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甚至在日後抗戰僵持階段最艱苦的

① 威靈思夫人：「怎樣營養兒童的腦筋」，《時兆月報》26-11（1931）：22。

② 梁啟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晨報副刊》1927-11-07，第1版。

③ 梁啟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時事新報（上海）》1922-08-08，第1版。

④ 梁啟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時事新報（上海）》1922-08-23，第1版。

⑤ 郭沫若：「論中德文化書」，《創造週報》5（1923）：13。

⑥ 郭沫若：「批評一欣賞一檢查」，《創造週報》25（1923）：6。

⑦ 郭沫若：「天才與教育」，《創造週報》22（1923）：5。

⑧ 梁啟超：「美術與生活」，《時事新報（上海）》1923-08-15，第1版。

⑨ 豐子愷：「音樂之門」，《音樂入門》（上海：開明書店，1926），第4頁。

⑩ 袁昌英：「跳舞的哲理觀」，《現代評論》7-174（1928）：8。

⑪ 成仿吾：「太湖紀遊」，《流浪》（上海：創造社出版部，1927），第160頁。

⑫ 朱光潛：「安諾德」，《孟實文鈔》（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第111-112頁。

⑬ 朱光潛：「從生理學觀點談詩的“氣勢”與“神韻”」，《我與文學及其他》（上海：開明書店，1943），第161、163頁。

日子裡，已然成為左翼文化巨擘的郭沫若最擔心的不是“物質保障”的匱乏，而是因“與國際文壇失掉密切的聯繫”而“缺乏精神營養”，“得不到新鮮的刺激與觀摩”。^①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所主張的並不僅僅是從外界獲取“營養”，還包括接受者“內部的自然的發生”，即所謂的將“外部的構精”與“內部的靈魂”相結合，對“原樣的素材”進行改造，使得新生成的“胎兒不與他所攝取的任何自然物相似，只是像她自己”。^②換句話說，只有在充分消化、整合外來“營養”的基礎之上，才能使其真正得以內化，成為自身有機體的一部分，否則，便會像魯迅所批評的那樣，“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毫無“營養”可言；^③而這種消化、整合的能力，同樣需要“經過練習”，才能夠不斷“進步”。^④正因為此，在日寇步步緊逼、國難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從30年代中後期開始，文化界“不得不一步步退向民族主義的本壘”^⑤，對於“精神營養”或“心靈營養”^⑥的關注重心也由中國之外轉移到了中國之內。一方面，“我國固有的傳統精神”“藝術家的平生遭際和他們對於人生的瞭解”，以及孕育著“民眾力量”的“社會生活”^⑦都被認為是“營養”的重要來源，而在這三者當中，最後一點尤為關鍵。另一方面，對這些“營養”以何種方式呈現，也就是“民族形式”應當如何確立這一問題，上至革命領導者，下至普通知識青年，都寄予了濃厚的興趣。

四 革命戰爭時期“營養”概念的負面政治內涵

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不但見證了民族意識的普遍覺醒和反帝愛國運動的蓬勃興起，還經歷了軍閥割據、國民革命、國共內戰，以及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的洗禮。在一次次社會風潮的衝擊之下，“營養”被同腐朽的生活方式、腐敗的政治制度、資本的殘酷剝削，乃至列強的瘋狂掠奪聯繫在一起，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批判，其負面含義也由此得以進一步衍生。值得注意的是，“營養”的這種用法通常是以一種隱喻性或反諷性修辭的形式出現的，而統治階級的“營養”過剩，必然帶來勞工階級的“營養不良”，因此，“營養”和“營養不良”又往往聯立並用，互為表裡。例如郭沫若就把“個人資本主義”比作“盲腸”，“於人體的營養完全沒有功用”，只會“吸納有害無用的廢物”，引發“盲腸炎”這樣的疾病；^⑧在「到宜興去」一文中，他又把資本家的吞併擴張比作“宏大的巨木”“遮蔽嫩芽”，為了“供他們自己營養”而使他人“無法生長”，從而為中國必須遏制個人資本主義的論斷提供依據。^⑨魯迅也曾以其特有的諧謔口吻，諷刺那些在所謂“國恥講義”中痛陳中國“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一轉頭卻“高高興興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政客們，用“成為血肉的營養”來暗指他們借國難以自肥的卑劣行徑。^⑩對於這些社會寄生階層，郭沫若則把他們稱作“營養不良的爬蟲”，通過對“營養不良”反語化使用，揶揄他們只不過靠著“環境生得太多”的剝削制度的蔭庇才能飽食終日，“坐享盛名”，實則是群不學無術的廢物罷了。^⑪作為對照，“相當的營養料”本應是社會底層民眾維持生存的基本前提，卻被資本家無情剝奪，勞苦大眾只能“以自己的膏血供老爺們營養”^⑫，

① 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新華日報》1943-03-27，第3版。

② 郭沫若：「文藝上的節產」，《創造週報》19（1923）：3。

③ 魯迅：「扣絲雜感」，《而已集》（上海：北新書局，1928），第98頁。

④ 豐子愷：「圖畫與人生」，《廣播週報》107（1936）：20。

⑤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242頁。

⑥ 見朱光潛：「談學問」，《談修養》（重慶：中州出版社，1943），第114頁。

⑦ 胡風：「林語堂論」，《文學（上海）》4-1（1935）：13。

⑧ 郭沫若：「盲腸炎」，《水平線下》（上海：創造社出版部，1928），第1頁。

⑨ 郭沫若：「到宜興去」，《水平線下》，第17頁。

⑩ 魯迅：「這也是生活」，《中流》1-1（1936）：4。

⑪ 郭沫若：「幻滅的北征」，《宇宙風》3（1935）：118。

⑫ 巴八：「擠乳」，《社會日報》1934-08-14，第1版。

“用手中粗末的飯團去營養他那勞作的身體”^①；即便如此，仍時常遭到後者的斥責，被冠以“不講求營養”的惡名。由黃任之創作於1936年的一幅時事漫畫，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幅景象：醫院院長面對前來就診的一群鶉衣百結、瘦骨嶙峋的工人，惡語相向道，“你們這班人多患的是營養缺乏症，所以瘦得好比猴子，應該吃些牛奶、雞蛋、新鮮水果”；工人聽罷心中充滿問號，沉默不語。^②數年後，茅盾在其「『霧重慶』拾零」中所記述的則是漫畫故事的現實版本。面對自然災害及官商勾結所帶來的糧食緊缺問題，1940年末，國民黨政府開始在大後方積極推行“營養改進運動”，號召市民在保證營養的同時節約飲食，孔祥熙還親自命人製作了所謂“新生活維他命西餐”，以資示範。^③對此，茅盾嗤之以鼻，指出這只是權貴階層用來愚弄公眾的把戲，實際上，在重慶高昂的物價狀況下，普通工薪階層連糊口都困難，“實在無可再節約，而且也談不到什麼營養”^④。這一由“營養”所構成的現實反諷在國統區幾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無怪乎黃的漫畫風行一時，在1941年前後又演繹出數個版本，被多家報刊轉載。^⑤

除了資本家之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代表了最大的敵對勢力，“營養”概念的貶義用法自然也與他們有關。1929年『畫報彙刊』上刊載的一幅漫畫便描繪了一個肥頭大耳、滿臉癡笑、西裝外套上印著“帝國主義”字樣的白種男人正在將鴉片煙槍像針管一般刺入對面站立的中國老者的胸腔；老人赤裸上身，一副窮苦人打扮，他表情痛苦，身子後傾，貌似已站立不穩，身後則是“中國之吸鴉片者”的標注；從他胸口噴湧而出的血液通過鴉片煙槍流入了已然半滿的桶狀物中，上面赫然寫著“帝國主義之營養品”。^⑥顯然，這幅漫畫的寓意在於，帝國主義列強把鴉片包裝成營養品，強迫普通中國人吸食，以便從他們身上盡情搜刮財富，供自身享用。中國之貧、國人之弱，皆由於此。而列強強制輸入的又豈止是鴉片呢？農業經濟學家李宏畧於經濟危機到達頂點的1935年所撰寫的「中國農家生活的營養方面」一文由是直陳：“中國農民的營養情形所以這樣地惡劣，直接是由於農家收入的不足……在自給自足時代，一般小農還可以勉強度活；一到國際資本主義掃滅了自然經濟的殘滓以後，他們便必然陷入於萬劫不復的悲運了！”^⑦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研究代表人物的李鼎聲也對此深表贊同，並把“左手挾有特權、右手握有巨資的洋老闆撈取大量油水”視為中國最大的危害，在這樣的社會中，連本國的剝削制度本身“也患着營養不良的毛病”。^⑧帝國主義的掠奪乃是造成近現代中國“營養問題”的根本原因，這一點無分政治立場，儼然成了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共識。而抗戰期間，身處日本帝國主義殘酷統治之下的廣大淪陷區民眾，就更是只能每日掙扎在死亡線上，缺衣少食，忍飢挨餓，飽受“營養”之苦了。用周而復極為生動的評價來概括，就是“他們最大多數是營養不良的，他們所能得到的營養，僅僅是免於餓死”^⑨。

五 “民族形式”論爭與中共話語體系中的“營養”

全面抗戰爆發後，在長達八年多的時間裡，由於日軍的大肆破壞和戰爭的大量消耗，物資匱乏一直是困擾抗日軍民的一大難題。在前線士兵因軍糧短缺無法持續作戰、“軍醫院中，超過20%的疾病是由缺少營養而導致的”^⑩危急情況下，學界忙於傳播營養學知識、開發營養代用

① 豐子愷：「繪畫與文學」，『文學』2-1（1934）：36。

② 黃任之：「營養問題」，『上海漫畫』2（1936）：9。

③ 「食物營養問題討論會第一次、第二次會議記錄」（1940年12月16日），臺灣檔案管理局藏，檔案號：028-050000-0170。

④ 茅盾：「『霧重慶』拾零」，『見聞雜記』（桂林：文光書店，1946），第67頁。

⑤ 見影天：「營養問題」，『上海半月刊』，21（1941）：8。

⑥ 「帝國主義之營養品」，『畫報彙刊』（1929年10月號）：28。

⑦ 李宏畧：「中國農家生活的營養方面」，『新宇宙』1-5（1935）：13。

⑧ 平心：「談利」，『人間事』（上海：當代印書社，1946），第32頁。

⑨ 周而復：「在敵偽的陰影下」，『松花江上的風雲』（香港：中國出版社，1947），第17頁。

⑩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中國紅十字總會救護委員會第三次報告」，貴州省檔案館藏，檔案號：M116-14，轉引自王公、楊艦：「抗戰營養保障體系的建立與中國營養學的建制化」，『自然辯證法通訊』8（2019）：63。

品、設置科研機構、培養專業人才、建立戰時營養保障體系等日常知識實踐，對“精神營養”的探討也從社會文化各領域逐漸收縮到了文藝作品的創作層面。文藝作品在戰時之所以顯得如此重要，與其“鼓勵前方將士的同仇敵愾、激發後方民眾的抗戰情緒”^①的群眾動員能力不無關係，而中共方面的積極提倡也成為其在此期間得以一枝獨秀的重要原因。在這樣一種高度政治化的語境中，此前關於“精神營養”的論說所揭櫫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如開放性、自主性、有機性等，與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及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結合在一起，圍繞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應如何締造，即文藝創作的“民族形式”究竟為何這一問題，形成了一套以“營養”為評判依據的完整的話語體系，並成為日後官方文藝政策的思想基礎。

首先，基於開放性原則，“民族形式”的創立要求“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無論是“外國的古代文化”，還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與新民主主義文化”，“無論是思想、學術、文藝或其他”，只要是“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當吸收，“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②而在這些外國文化當中，最有益的“滋養品”，最合格的“模範”和“先生”則是“蘇聯的文學、藝術，乃至一般的文化”。^③不僅是其中所蘊含的“寶貴的革命經驗”，還包括這些作品的“創作過程和作家的處理題材的方法與生活態度”，都值得我們“欣賞”“觀摩”和“學習”。^④在這之後，還需要借鑒“現實主義的大師們”的作品，並在研究他們的基礎上“誦讀”雨果、大仲馬等“浪漫主義的名家”，以便“更深切地理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特點”，並使其為我所用。^⑤不僅如此，在文學語言方面，也“不要以為用外來語是‘歐化’”，“只要精當”，就“一律採用”；^⑥實際上，中國話裡本來就有“不少的外來成分”，近代以來“外國文藝作品的逐譯”對“中國文藝的營養和影響”更是有目共睹，“適當的歐化”不但不會損害中國的語言文字，反倒使它“更豐富、更謹密”，有助於“中國語文改革”。^⑦

其次，基於自主性原則，“民族形式”的創立要求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場上，對外來文化加以細緻的“咀嚼”“消化”，將其“分解為精華與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進而形成“自己的營養分”。^⑧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郭沫若，都鄭重告誡中國知識分子，以歷史經驗為教訓，切勿重蹈“全盤西化”的“錯誤觀點”的覆轍，“決不能生吞活剝的、毫無批判的吸收”。相反，有必要在“融化提煉”的基礎上，“使它化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從新創造出一種新的事物來”。^⑨這一新的事物正是毛所總結的中國文化“自己的形式”，也即“民族形式”。為了達成上述目標，除了廢止“洋八股”，“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⑩之外，還必須從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遺產”中“攝取營養”；^⑪這些“遺產”儘管存在很多問題，處於較低的發展階段，卻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人民（大眾）的生活樣相，解剖中國人民的觀念形態，汲取中國人民的文藝詞彙”，並由此“克服它們”、超越它們，“創造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⑫這一富於辯證色彩的文化建構策略落實在具體的創作活動中，就需要作家給予民間文藝及傳統文藝以必要的重視，在體裁上借鑒“舊詩詞的

① 張靜廬：「文藝書刊不是“糖果”」，《天下文章》2（1943）：3。

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98/99（1940）：40。

③ 郭沫若：「答『國際文學』編者」，《沸羹集》（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第5頁。

④ 郭沫若：「中蘇文化之交流」，《羽書集》（香港：孟夏書店1941），第133頁。

⑤ 茅盾：「學習與摹仿」，《創作的準備》（上海：生活書店，1936），第6頁。

⑥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大公報（重慶）》1940-06-09，第2版。

⑦ 周而復：「關於語言」，《新的起點》（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第48頁。

⑧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98/99：40。

⑨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大公報（重慶）》1940-06-09，第2版。

⑩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34頁。

⑪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大公報（重慶）》1940-06-09，第2版。

⑫ 胡風：「現實·內容·形式——以爭取現實主義底勝利為中心」，《論民族形式問題》（重慶：學術出版社，1941），第81頁。

協和格調”^①或“秧歌”這樣“受到各個地區人民歡迎”的“中國民間優秀的藝術形式”；^②在內容上學習“舊小說中的個性描寫”，模仿“其表現感情的方式、表現思維的方式、認識生活的方式”；^③在語言上用“那些豐富的文白語彙”來“充實我們的武裝”，^④力求避免“佶屈聱牙、拖泥帶水”的“番鬼佬”話。^⑤通過這些努力，務求將“中國舊有的”和“外來的新的有益的營養”相結合，打造出集思想性與藝術性於一身的社會主義“新文藝”。^⑥

最後，基於有機性原則，“民族形式”的創立要求在“時代的要求”“大眾的要求”的基礎上，實現內容和形式的和諧統一。要做到這一點，既不能淪為“空虛的或者有害的”思想的附庸，又不能採取“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裝在”一起的錯誤方法，^⑦而是要盡可能地“貼近實際生活”，扎根“民族現實”，瞭解老百姓的真情實感、所思所想，並將它們“整合到以現實主義方法為基礎的作家的認識過程裡面”，加以“組織”和“改造”，從而使其“呈現出真實的面貌來，取得思想的力量或藝術的力量”。^⑧換句話說，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必須被“放在生活的本質的深處和激烈的鬥爭裡面”，^⑨讓它的“根須深深插進黑土”，“從人民大眾吸收充分的營養”，^⑩從而“培植生機，創造繁茂光華的世界”。^⑪而這“從黑土裡面生長出來”的民族文藝，也應當以“大眾”作為最終的衡量標準，不但要“被大眾喜聞樂見”，還需成為“大眾享有的成果”，^⑫與其“文化生活一同發展，一同前進”^⑬。

六 餘論

且不論毛澤東對於“民族形式”的強調，尤其是將其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聯繫在一起，是否有針對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具有留蘇背景的黨內高層領導人的政治意圖，也不論胡風通過對“民族形式”的闡發，反對“用強制的干涉去支配”文學並使它“成為說教的工具”^⑭背後到底是出於怎樣的動機，晚清以來“營養”概念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流變所反映的思想線索與精神特性在中共關於“民族形式”的話語論述中依然留下了清晰的印記。經過毛澤東的揭櫫、郭沫若的詮釋、胡風和周而復等人的補充，“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大眾服務”的指導原則得以正式確立，而作為其重要“科學”性來源的“營養”也和“民族形式”“中國作風”“中國氣派”這些理論概念一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社會主義內涵”也為億萬中國人所熟知，並一直沿用至今。

儘管如此，借用王國維先生的話，“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亦有一時代之“營養”。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隨著社會現實的改變，新的觀念、新的認識也在不斷湧現。在由對象、符號、心靈所構成的動態關係中，“營養”的思想含義也因新的“解釋項”的出現而持續延伸和擴展。1949年年中，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最終勝利、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之際，曾長期在冀中地區從事黨的文藝工作的侯金鏡提出了“工人文藝”的口號，以此作為“做了新社會主

①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大公報（重慶）》1940-06-09，第2版。

② 周而復：「秧歌劇發展的道路」，《新的起點》，第109-110頁。

③ 胡風：「現實·內容·形式——以爭取現實主義底勝利為中心」，《論民族形式問題》，第81頁。

④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大公報（重慶）》1940-06-09，第2版。

⑤ 周而復：「關於語言」，《新的起點》，第48頁。

⑥ 周而復：「秧歌劇發展的道路」，《新的起點》，第109頁。

⑦ 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毛澤東全集》第12卷，第140頁。

⑧ 胡風：「現實·內容·形式——以爭取現實主義底勝利為中心」，《論民族形式問題》，第81頁。

⑨ 胡風：「由現在到將來」，《在混亂裡面》（重慶：作家書屋，1945），第51頁。

⑩ 郭沫若：「羅曼羅蘭悼辭」，《沸羹集》，第275頁。

⑪ 胡風：「由現在到將來」，《在混亂裡面》，第51頁。

⑫ 胡風：「通過語言問題——文字改造和大眾的國民文藝底發展」，《論民族形式問題》，第94頁。

⑬ 周而復：「秧歌劇發展的道路」，《新的起點》，第109頁。

⑭ 胡風：「由現在到將來」，《在混亂裡面》，第51頁。

人”的工人階級在“思想鬥爭”過程中所急切需要的“營養”；^①與此同時，身處上海的尤磊等人則重點強調了電影藝術這一“文化教育的工具”區分“糖衣毒素”和“精神營養”的重要職責，^②進而把好萊塢“工廠裡的出品（美國電影）”稱作“紅丸、白粉、海洛因”，對其“麻醉人民思想”的危害大加鞭撻，並主張“應該予以檢查，甚至肅清之”。^③這些充滿戰鬥色彩的言論圍繞著“營養”問題在人民與敵人之間劃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既標誌著文藝界“吸收營養、改造思想、掃除舊趣味”^④的全國性運動就此開始，也預示著一個新的歷史時代的來臨。

[責任編輯：晉暉]

① 侯金鏡：「記兩個紡織廠的工人文藝活動」，《華北文藝》4（1949）：45。

② 尤磊：「整頓影評界」，《影劇雜誌》4（1949）：2。

③ 白鷗：「不讓美英電影繼續播毒」，《影劇新地》4（1949）：3。

④ 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第1版第4次印刷），第69頁。